

编委会

主 编

季羨林 冯其庸

顾 问

陈国灿 徐萍芳 谢辰生 丹 青 孟凡人

副主编

李 肖

编 委(以姓名拼音字母为序)

★阿不利木·克尤木 ★柴剑虹 ★侯世新 罗 新 梅建军

孟宪实 荣新江 ★汤士华 王炳华 王 素

伊斯拉菲尔 张国刚 ★张永兵 朱玉麒

(名前加★号者为常务编委)

出版说明

阿·冯·勒柯克的《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记》的德文原题为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于 1928 年在莱比锡正式出版。承蒙耿世民教授的热心推荐和李肖博士的大力支持，其首个中译本（齐树仁、耿世民校译）得以列入“吐鲁番丛书”丙种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表明，勒柯克率领的这次考察自 1913 年 4 月中抵达喀什起，到 1914 年 3 月初离开图木舒克经喀什出境，历时 11 个月。因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其间勒氏一行并未来得及涉足吐鲁番地区，而在库车、巴楚一带劫掠并破坏了大量古代遗址，盗运走珍贵文物 156 箱。对勒柯克及德国吐鲁番考古队四次考察的介绍，可参考中译本所附耿世民教授的文章。本书既是记载此次考察行动经过的“实录”，又附了百余幅当时所拍摄的照片、线图，其十分宝贵的资料价值自不待言；同时作为“盗宝者的自白”，书中也暴露了他们的政治与文化偏见。原书多处使用了“东突厥斯坦”这个地理名称，尽管使用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属于中国的新疆地区，但毕竟隐含着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在中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祸心，理所当然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并予以厘正。因此，下列几点是我们在阅读和使用此书时应该注意的。

第一，由于第四次考察的特殊时代背景，书中相当充分地表露了德、俄、英帝国在争夺我国新疆这个战略要地上的昭然野心和他们之间的狼狈为奸与勾心斗角，军事入侵与搜集政治、经济情报和“科学考察”始终是并行不悖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对各族民众捍卫主权与进行反封建革命的仇视与污蔑。

第二，虽然勒柯克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南疆地区，他们这次进入新疆并未得到我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只有开后门得来的喀什地方政府的一纸“许可证”），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非法盗宝者。他们打着“保护文物”的幌子，用野蛮的“科学手段”盗掘遗址，切割精美壁画，搬走雕塑，搜捡各类文物。书中有许多赤裸裸的强盗语言，既可让我们清醒认识其盗者之心，也为我们追寻库车—巴楚一带寺窟文物遭破坏的踪迹及被盗运的下

落提供了难得的线索。需要注意的是,盗宝者同时也使用了一些欲盖弥彰的语言。其典型例子便是书中关于在克孜尔“红穹洞”发现“寺院图书馆”的叙述。我们可以将它们与同氏另一专著中的文字对比阅读(参见郑宝善译《新疆文化之宝库》,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前不久德国著名梵文学家史凌格罗夫教授(D. Schlingloff)专门印刷了题为《古代新疆一所寺院图书馆及其命运》(*Eine Ost-Turkistanische Klosterbibliothek und ihr Schicksal*)的小册子,指出勒柯克和格伦威德尔有关叙述的含糊和矛盾,怀疑该洞仍埋有西域语文写本。史氏将此册子寄给耿世民教授,呼吁我国学者能追索清楚。(耿先生为此专写的文章附后)

第三,勒柯克以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维吾尔学家著称于世,虽然因盗掘文物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其研究方法上也有某些独到之处,但从本书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对待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看法是立足于西方文化中心论之上的,他处处力图证明新疆文化艺术“西来”,“完全缺乏中国的影响”,他的观点尤其集中表现在书的“结束语:文化与艺术史的成果”一节中,他一再强调“中世纪日耳曼欧洲和中亚之间的关系”,否认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尽管他也承认“文化因素始终在来回转移、接受和变化”,却重申“什么都必须沿着希腊的足迹来对待”,连佛教文化也要“追本溯源到希腊”,甚至主观地认为中国的丝绸传到西方时是“很重的单一颜色没有图案的纺织品”,只是中亚与西方将它们精工细作制成了华丽珍贵的衣衫,“才在中国得到了华美的仿制”。他还提出连中国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也是“公元前 3000 年(欧洲)有较高的文化因素从西北方涌向中国北方”的结果(众所周知,我国著名的仰韶、半坡彩陶距今至少有 7000 年的历史了)。这种明显的偏见歪曲了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当然也大大影响了他对新疆文物判断与分析的科学性。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 年 11 月

前 言

第四次“吐鲁番”之行(这次并未到吐鲁番,1913年3月至1914年3月)从一开始就遇到种种不幸。

中国人感兴趣的是改变政府的形式。满洲人被驱逐了(我从未发现满洲人与“中国人”在特征和文化上有什么不同),他们那并不特别强大的统治根本就不可能被更好的东西代替;正相反,令人鄙视的人,常常是可耻的犯罪分子,他们占据了重要的行政管理岗位,在整个地区——我指的是新疆,不是中国内地——可惜的是以前的安宁、安全和信任受到了破坏。所有的东西都比在满洲皇帝的统治时期贵两三倍,当地的商人,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而只能在商道上见到了。

对我们而言,这种变化以及中国政府由此拒绝为我们签发政府护照使我们感到遗憾;圣彼得堡的拉德罗夫(Radloff)先生拖延为我们办理护照是另一件倒霉的事。

后面这件事情在损失了不太多的时间以后得到了解决。中国政府的护照,格·马卡尔提尼(G. Macartney 汉名马继业)(译校者按:即英国第一任驻喀什领事)先生友好地帮助我们解决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协助,我们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次旅行。我们所挽救的那些非常珍贵的壁画很显然部分或全部将毁于1916年的强烈地震中或成为当地人在破坏壁画时的牺牲品。

我们同地方当局打交道的经历在这本书中也可以读到。总是有种不愉快的感觉,一种不安全感,这是对以前的安全和安宁相比较而言的。

所有这些令人烦恼的事情使我患了严重的疾病,而巴尔图斯(Bartus)先生则患了症状较轻的病,以及难以想象的是早些时候我的忠实助手遭到了暗杀。

当我们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气氛令人感到郁闷。在我熟悉的维吾尔人中阿克萨卡尔(Aksakals)(按:即当地人的首领)以及在他们的商人

中总能听到一些词(sokusch[突厥语],muhärab[阿拉伯语 muhäraba],dschäng[波斯语])——所有这些话都是“战争”的意思——那么这场战争将发生在哪里以及谁跟他打仗没有人愿意说。

后来我看到流传在新疆集市那些不可靠的谣言是怎样解释的。

在这部作品中我回忆这些个人经历的同时,我要对一大批赞助者和朋友表示感谢。

首先感谢德国吐鲁番委员会的先生们,他们组织了第四次考察。他们是委员会主任,枢密顾问吕德尔斯(Lüders)先生,枢密顾问爱德·迈尔(Ad. Meyer)先生,W.舒尔策(W. Schulze)和F. W. K. 米勒(F. W. K. Müller)教授和出钱的人——我们尊敬的赞助者J. 西蒙(J. Simon)、阿伦霍尔德(Arnholdt)、双博士冯·施瓦巴赫(DD. v. Schwabach)先生和伯德(Bode)阁下。他们同克虏伯·冯·博伦(Krupp v. Bohlen)一起捐出了所需费用的一半;皇帝陛下支付了另一半费用。

由于这些资金,出发考察有了保障,所以我感谢格·马卡尔提尼先生给予我们的友好关切,使我们取得可喜的成果。我们衷心地感谢他给予我们的宝贵支持。

我们进行了四次关于东西方关系的考察,在经历了这次最艰难的不快考察和危险,把我们的收获珍藏在我们博物馆的陈列室以后,战争爆发了。绝大部分工作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足够的必要助手。巴尔图斯始终献身于工作,但他的努力和技巧对处理大量材料却贡献很少。

我为有这样的忠实朋友感到幸福。当显示出当地有兴趣的壁画,清晰地证明希腊古代艺术与远东艺术的关系时,箱子里的珍藏品大概快腐烂了。我曾对我亲爱的尊贵朋友们提到了这一悲惨的现状。赞助人卡尔·郭尔德施密特(Karl Goldschmidt)博士、特·郭尔德施密特(Th. Goldschmidt,埃森化工厂)十分关切地倾听我的意见。几天之后他通知我:他同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弟弟,我的老朋友化学家教授汉斯·郭尔德施密特(Hans Goldschmidt)博士捐助我5万金马克的费用,以及克虏伯家族——我们最老的赞助者克虏伯·冯·博伦(Krupp von Bohlen)先

生本人想继续赞助 3 万金马克。

用这大笔费用,修复了无数的绘画并得以陈列与展示。

可是后来通货膨胀了。如果不是卡尔·郭尔德施密特博士及其长子特·郭尔德施密特博士继续帮助我的话,几乎不可能继续工作了。他们其中的每一位都给了我 500 荷兰盾,一直到政府再有能力支持这件事情。这在当时是一大笔费用,我可以继续工作了。

我的两位老朋友汉斯(Hans)和 B·郭尔德施密特博士也已去世。但是他们的儿子、埃森的特·郭尔德施密特博士和基尔的 B·郭尔德施密特博士仍健在。我特别感到满意的是,能在这里对他们表达公开的谢意。只有这无私的郭德施密特(Goldschmidt)和克虏伯(Krupp)家族的帮助为德国人民拯救了价值连城和富于启迪性的古代文物。特·郭尔德施密特博士的愿望不是把提供的珍贵艺术品弄到自己手中,而是要博物馆保存我们第四次考察的成果。

此外,对领导当局我也表示真诚的感谢。部长先生、教授贝克(Becker)博士和文化部司长嘉勒(Gall)博士先生为我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以及同等重要的空间,为能陈列现已完工的壁画和正在修复的壁画存放及展出。建筑顾问魏勒(Wille)先生熟悉后来这些文物的艺术作品结构的原委,他以娴熟的技术完成了这项任务。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出版商,柏林出版社(Dietrich Reimer[E. Vohsen])的先生们不顾自己的风险把我的发现以一套六部巨大珍贵画卷发表了,与此同时莱比锡的 J. C. 辛里克斯(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书店以富有魅力的形式出版了通俗版。

D·莱默尔(D. Reimer)出版社带插图和说明的著作在这里又多次再版。我对该公司允许我使用这些作品表达我诚挚的感谢。

阿·冯·勒柯克(A. von Le Coq)

1927 年秋季于柏林—达勒姆(Dahlem-Berlin)

导 论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吐鲁番”考察归来(1907年1月和6月)的短暂时间里,以及旅行中获得的文物顺利地运抵柏林之后,在柏林开始了一个愉快的辛勤合作时代。

结果是令人吃惊的。早在1904年,F. W. K. 米勒教授就辨认出摩尼教教徒(Manichäer)消失文献的残留部分,它们是出自吐鲁番绿洲叙利亚文变体的某些写本。其中几篇是以鲜为人知的伊兰方言写成的,这种方言是在大约较晚阶段在吐鲁番北部的葡萄沟(Bulayik)叙利亚—基督教堂发现的数量众多的景教—基督教的语言。这些写本是用漂亮、但却难读的粟特文(soghdisch)书写的,大部分为佛教内容。更多的是使用变化很小的叙利亚—福音体文书写的,这是一种更为容易识读的文字。由于这样一种特别美丽的叙利亚文字书写的残文,发现了叙述神圣十字架的文书。哥廷根的F. C. 安德里亚斯(F. C. Andreas)和F. M. K. 米勒(F. M. K. Müller)通过出现的月份名字和国王的封号重新释读出一种完全消失的、曾经流传很广的伊兰书面语言,也就是粟特语(古代Soghdiana地区居民的语言),其首都是极为古老的撒马尔罕和富饶及久享盛名的布哈拉。10至11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Al. 贝鲁尼(Al. Beruni)(同大多数“阿拉伯”的历史学家一样,不是阿拉伯血统,而是一位伊朗的阿拉伯通)除了在其珍贵的“年表”中表述了国王的封号以外,为我们保存了古代粟特人的月份名称表,这得到了证实。其他就是哲学领域的贡献。

但拉德洛夫(Radloff)先生不懂佛经。他的部分翻译是怪诞的。致使皮舍尔(Pischel)请求F. W. K. 米勒(F. W. K. Müller)先生来承担佛经回鹘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件事被接受了,在F. W. K. 米勒的工作室里出现了那种神话般的学术文献。其题目为《回鹘学研究 I-III》(Uighurica I-III),这些作品为这位拥有天才智慧却总是谦逊的学者头上编织了

[1]E. 瓦尔德施密特 Waldschmidt 和伦茨 Lentz,《耶稣在摩尼教中的地位》。德国普鲁士科学院 1926 年论文,哲学历史类 4 号,W. D. Gruyter, 1926 年柏林出版。这个写卷保存在英国博物馆,来自绘画和手稿宝库敦煌,这是奥勒尔·斯坦因先生(Aurel Stein)从沙洲敦煌图书馆中发现的。感谢英国博物馆当局,在斯坦因先生善意的支持下将写卷交给他们研究。巴黎的保罗·伯希和先生(Paul Pelliot)也以其独特的自由方式支持了这一工作。

新的桂冠。我熟悉他的研究状况,并得到允许参加了许多准备工作。我们经常坐在一起,忘记吃饭喝水一直到晚上 7 点。这美好的工作和富有成就的日子,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时我享受了上帝赐予的喜悦。每一天都带来新的和重要的东西。

我承担了用回鹘语书写的摩尼教文献以及少量的突厥“如尼”文的写本整理工作。经过潜心研究并在新疆逗留了大约两年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维吾尔人讲的新疆现代语。在 F. W. K. 米勒先生研究室度过的时光,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并且逐步细心地研究了当时现存的文献资料,我开始发表早期回鹘摩尼教文献。因为当时的语言与佛经语言是不一致的,事实也是不了解的,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这些工作总算是有基础,工作在这个基础上还继续着。

早在 1912 年,巴黎的沙畹(Chavannes)和伯希和(Pelliot)对于了解来自中国的摩尼教就作出了较大的贡献。除了美国、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和俄国学者的著作以外,对最新^[1]的伟大中国摩尼教画卷的研究就是瓦尔特施密特(Waldschmidt)博士和伦茨(Lentz)先生的译文,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不幸的是,我们热心的支持者和赞助者、枢密顾问皮舍尔(Pischel)、柏林大学的梵文学家在赴印度的路上染上了危险的疾病。他的位置现在由枢密顾问 H. 吕德尔斯(H. Lüders)接替了。他博学的尊敬的夫人也是一位优秀的梵文学家。她竭尽全力将无数有时是很小的古印度贝叶残片与克孜尔(Kyzil)红色穹顶大厅的其他残片拼在一起,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艰苦的工作。严峻的目光、耐性和非凡的知识使这位女士赢得了荣誉。吕德尔斯教授后来和他的夫人一起把这复原的珍贵写本出版了。这是印度戏剧残稿,可以判断印度戏剧的出现比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还要早几个世纪。

当时,博物馆一条通往工作室的走廊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里,吕德尔斯博士夫人坐在她那梵文著作旁边,那里西格教授(Sieg)和西格灵博士(Siegling)坐在他们的研究室,推敲“吐火罗语”(Tocharisch)源自中亚罕见的欧洲语言的重大秘密。研究工作也经常给我们带来喜悦——我们大学的比较语言学家、枢密顾问 W. 舒尔策(W. Schulze)的

造访。在另一个房间里，F. W. K. 米勒先生把他的业余时间用来研究回鹘语(ughurisch, 中古突厥语)佛经。一大批这样的写本，在第一次考察后由格伦威德尔教授(Grünwedel)交给了圣彼得堡的俄国院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拉德洛夫(Wassilij Wassiljewitsch Radloff)^[1]做整理工作。

[1]拉德洛夫先生来自柏林，原来叫威廉·拉德洛夫。他来到俄国并从事突厥语的研究工作，就此他曾发表过许多、但不总是完全靠得住的书。尽管它有很多越轨行为，在许多方面我是要感谢他的。特别是当俄国爆发了可怕的野蛮行动的时候据说他死于饥荒。这些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2][这里指的是威廉海姆·托姆森(Vilhelm Thomsen)——译者注]这位伟大的学者，就是在所有的人情事物上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遗憾的是就在当年5月，他满85岁时，永远离开了我们。

突厥“如尼文”(Runen)著作惟一完整的一页，我提供给哥本哈根的突厥学老前辈、我们尊敬的朋友和赞助者威廉海姆·托姆森教授阁下(Vilhelm Thomsen)，以示小小的敬意，他是一位著名的鄂尔浑(Orchon)和叶尼塞(Jenissei)“如尼文”解读学者。他为实现我们的请求而高兴，他以高超的技巧完成了任务。^[2]

遗憾的是，这一友好合作由于格伦威德尔关于发现摩尼教优先权的非分要求遭到了破坏。

此外，格伦威德尔身染重病，不得不长期住院。他的助手G. 胡特博士(G. Huth)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如果不是旅途的艰辛，就不会促使他过早地离开人世。还有，不仅格伦威德尔还有巴尔图斯(Bartus)和我在回来几个月以后都染上了严重的皮肤病。他们两位患带状疱疹，我得的是红斑癣，这都是皮肤过敏引起的难以忍受的疾病。

艺术史领域的成果极其重要。印度西北部和大夏(Bactrien)的希腊文化艺术同远东佛教艺术的关系以前不能得到证实，在这里毫无疑问成功地得到了证实。

格伦威德尔在病愈以后，着手绘画研究工作并于1912年献给我们这部费了很多心血(尽管尚有几处较大的错误数据)富于教益的书《古代(新疆)佛教遗址(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此后不久，就在我第四次考察出发前我的大型壁画集“高昌”(Chotscho)完工了。

1906年，当我们在库车逗留的时候，皇家博物馆的总领导权由舍内(Schöne)阁下手转移到枢密顾问伯德(Bode)手中。从他那里为我的吐鲁番绿洲石窟壁画陈列得到了必要的资金。

发表壁画集“高昌”(Chotscho)，也是得到由他弄到一笔同名款项的支持，这是柏斯尔(Baessler)档案馆给我的资助。(此外，1904年9月至1907年2月间第二次考察全部耗资约25000马克，当然为此还需很高

的运输费,就是 103 个箱子,部分很重,要花费 17000 马克)。

1912 年决定进行一次新的考察。枢密顾问 H. 吕德尔斯同俄国的学者们顺利地取得了联系并为即将进行的第四次考察办理行李运输免税通过俄国。

我担当了这次考察的领导。这次行程的目的地除库车绿洲以外特别是大沙漠南部德国人尚未涉足的城市遗址。那里是斯坦因(A. Stein)先生取得许多划时代意义成果的地方。我试图在这一地区南部进行工作。这里部分地区处于完全无水地带。最好是冬天在这里工作,尽管有麻烦,必需的水可以以冰块的状态带进去。

本应该 1912 年秋天出发,但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于 1911 年爆发了驱逐满清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我们的报纸根据俄国的消息传播了关于新疆耸人听闻的报道。

1912 年那里还有中国居民的动乱,也就是主要大城市里无数的流放犯、赌徒、盗贼和其他臭名昭著的社会渣滓反对清朝政府官员的行动。

俄国人企图利用这一动乱时机把新疆从中国人手里夺去并入他们中亚地区的省份中去。新疆出产优质棉花,而俄国人非常希望得到这一省份以满足他们本国全部棉花的需要量。为了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辩解,俄国报纸充满了夸大动乱的消息,并派军队携枪越过铁列克山口(Terek-Paß)进入喀什噶尔。所谓保护俄国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和这支很差的中国军队制造冲突以图吞并整个地区。

德国外交部在北京为我和再次陪同我的巴尔图斯(Bartus)申请政府证件。这一申请被中国人拒绝了,理由是中国政府不可能“在西部省份”他自己臣民的性命都保护不了的地方保护外国人的性命。

我从未相信过欧洲人在当地的处境会受到威胁,我并为此写信给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这位是最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我曾多次受到他好客的接待,对他我感到极大的信任。

格奥尔基·马卡尔提尼(George Macartney 汉名马继业——译者注)先生很快就回答了(1912 年 8 月 24 日)并证实了我的设想。他写道:

“当然,从 1911 年 12 月到 1912 年 5 月发生过多起中国人谋杀中国

地方官员的事件。第一个牺牲品是伊犁河谷地区的将军,在他被杀害以后伊犁地区宣布为独立共和国。长时间,这个新的共和国同西部省份的省会乌鲁木齐形成严重的敌对状态。这一争端终于得到了解决(1912年8月以前)。现在伊犁和新疆北部都很平静。伊犁革命在其南部邻近地区造成反响。首先是道台(政府主席)以及阿克苏巡抚被谋杀了。在这之后是库车和焉耆的厅官(地方长官),还有喀什噶尔的老袁道台的丧钟敲响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喀什噶尔的巡抚(地方长官)于1912年5月7日夜里被一帮中国流氓和被驱逐的士兵杀戮了。谋杀凶手的头子是一个中国的屠夫,姓边。

同一天,一个不受欢迎的军事长官在喀什噶尔新城被杀了。一些其他地方官员也倒毙于血泊之中。但是最近两个半月以来谋杀事件停止了,恢复了信任。

在此期间,这个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它阻止事态恢复正常。在较大城市喀什噶尔、阿克苏、莎车(Yarkand)等等——凡是有中国流浪汉的地方——有由最差的中国贱民组成的集团。这些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未经任何许可组成了民团,他们经常恫吓民政和军事当局并向他们敲诈钱财。这种掠夺敲诈行为与所说的爱国主义毫无关系;他们只愿牺牲大众,富裕自己,这与衙门(政府官员)的寄生虫没有区别。正规军(liang-tsu)也加入了这些集团。这些联合起来的民众叫作吉玛尔—巴兹集团或叫(赌徒集团)。^[1]在这种情况下,常规军与这种集团作战或解除他们的武装是不可能的。而对外国人特别重要的是,吉玛尔—巴兹集团把他们的力量都用在对付他们同胞身上了(中国人)。

[1] Kimar baz 波斯语,下层人沉湎于用兽骨玩的一种赌博。一个吉玛尔—巴兹、做一个玩骨头的赌徒就是失去了所有的体面与诚实,吉玛尔—巴兹是最厉害的骂人话。

当地的维吾尔人,在整个动乱期间表现的是一般的漠不关心,并不感觉有什么负担,就像俄国或是英国的臣民一样。我们外国人当然同吉玛尔—巴兹也发生过几次冲突。没有任何一次冲突表现出吉玛尔—巴兹有任何兴趣有意识地和我们争吵。……俄国报纸上的消息夸大了危险性。

除此之外,这一地区或多或少现在已经处于俄国人控制之下,俄国人在喀什噶尔眼下有800名军人,这是由于吉玛尔—巴兹的原因派到这个地区的。”

马卡尔提尼先生把友好的邀请同这一描述联系起来,我应该到喀什噶尔去,他将促成我进入这个地区并对考古工作本身施加影响。两位年轻的英国女士,科姆普和马克·道嘎尔女士(Kemp & Mrs Dougal)根据类似的邀请安然无恙地路过了这个地区。

由于这封信的原因我得到了批准,不顾自己的危险和巴尔图斯先生一起登程了。枢密顾问吕德尔斯和吐鲁番委员会同意这种做法。

为了通行无阻地路过俄国,办理必要的证件由拉德洛夫先生(Radloff)在圣彼得堡申请并得到他的许诺。必要的资金由伯德(Bode)阁下和吐鲁番委员会筹措。我们的老赞助者阿伦霍尔特、冯·施瓦巴赫博士、雅莫斯·西蒙以及伯德阁下筹集一半资金,皇帝陛下愿意出另一半资金。出发时间定于1913年3月底。

在我描述这次旅行期间,我必须提到几处应注意的地方,俄国人到达喀什噶尔这些地方为的是与中国人挑起争端,作为他们进一步吞并这个地区的借口。

据报道,“这个地区1912年9月已经完全安宁,如没有一个人(马卡尔提尼先生)的聪明、勇敢和机智,事情就会完全是另外的样子。由于动乱的原因,俄国人派几百名士兵驻扎在这个地区,他们有很多与革命者发生摩擦的机会。俄国军队驻扎在城门外,中国军队驻扎在城内,在太阳下山时城门总要关闭。但是有一件容易引起严重误会的事情。

中国农历五月,中国人总是大放焰火,以节日的方式为亡者焚烧纸制祭品。这是一个重要仪式,一般是在喀什噶尔城的商业区寺庙前的广场上举行。不知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惧怕,有人跑到俄国兵营报告说,一个俄国臣民的财产被焰火烧了。立即有一个分队的俄国骑兵进城,下马以后破坏节日焰火,根本不把中国地方官员放在眼里。自然出现一些骚动,但并没有人受伤,只是突然马匹受到惊吓散开跑回兵营。

在此期间,按照规定时间关闭城门,而俄国士兵还停留在城里。没有骑手的马匹回到俄国兵营并引起了慌乱,这场慌乱比关闭城门大得多。很快谣言四起,说什么关在城里的俄国人马上就会被杀。俄国主力部队立即奔赴最近的城门并用炸药炸城门。而他们的恐惧是完全没有

道理的。他们对中国官员没有表示丝毫歉意，造成的损失中国人自己承担，受了损失还遭受辱骂。一直到俄国人在城门前设立了岗哨。若没有大不列颠代表明智的和解建议，事件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当俄国人对中国当局进行类似的挑衅时，吞并中国这一地区没有获得成功以后，俄国人着手进行同样更加露骨的行径。

在喀什噶尔，如上面提到的由坏分子组成的骚乱民团用掠夺和暴力行为制造恐惧和混乱。恐惧和混乱变成了对和平居民的威胁，喀什噶尔的每周集市（居民赖以生存的）变得商品短缺了。中国的司令官（杨提督）决定把这帮民团遣送到伊犁谷地的伊宁（Kuldscha）去；为了制服民团的胡作非为在那里驻扎了足够数量的守纪律的中国军队。为了避免发生冲突遣送工作在午夜进行（我认为中国军队愿意选择这个时间）。为了遣送民团的妇女和儿童以及行李雇了很多车辆，大家准备出发，居民们很高兴，他们终于摆脱这些压迫者可以开始自由呼吸了。但当夜里启程的时候，突然得知俄国军队离开了领事馆偷偷绕城池向东而来。这一遣送举动虽然是秘密进行的，但还是被俄国人发现了，而当他们看见的时候表现出好大的不高兴。

当问到这一行动打算的时候，回答是，他们要在通往巴楚（Maralb-
aschi）的路上进行演习！喀什噶尔部队还从来没有进行过夜间演习，因为中国民团——大约 5000 人——也要沿着这条路前进，部队行动的真实目的不难猜出。

中国人被警告不得在午夜行军，而是要在早上 8 点钟才能行动。这样就不会发生任何冲突。

这一情况我是从一位英国女士，E·G·科姆普小姐的文章中得知的。她当时正在喀什噶尔逗留。文章是以“在中国新疆漫游”为题发表的。发表在《中国评论》（*Chinese Review*）第一卷第 3 期 1914 年 7 月出版（另外参照该书“走过中亚地区和绿洲”，Mis Ella Sykes und Brigadier-Generl Sir Percy Sykes 合著，1920 年伦敦麦克米伦版，294 页）。

我从我的熟人喀什噶尔的维吾尔人和阿富汗商人那里得知，对下面不容怀疑的细节不能保持沉默。根据这一情况，俄国军队在中国人通过

[1] 在新疆的阿富汗商人,据我所知要么是阿富汗埃米尔的臣民,大部分来自巴德绍尔和斯瓦特谷地[Badschauer und Swat]—1906年我在和田遇到几个来自喀布尔的塔吉克人[Parsiwan人],要么是居住在印度的阿富汗‘帕坦人 Pathan’,特别是来自旁遮普穆尔坦人 Multan im Pandsch-ab。

新疆喀什噶尔英国总领事馆负责保护所有的阿富汗人。攻击阿富汗臣民和英属印度的印度人,俄国人自然会卷入与阿富汗和英国的困难之中,这是俄国人必须避免的。值得注意的,来自穆尔坦的帕坦人部分是什叶派 Schiiten。

的荒野路段进行布防并架起了机枪。无休止的等待——天已经很晚了——尘土飞扬,在这个干燥地区通常猜测是大量人畜临近了。这一切都明确表示要进行一场战斗!

但是人们很快从尘埃中发现阿富汗人的缠头巾。^[1]这是一支庞大的喀什噶尔阿富汗商队,其后是中国的民团队伍;尾部是来自喀什噶尔的印度商人,这样事情就圆满解决了。哥萨克上校气呼呼地返回喀什噶尔。

人们对此冒险报之一笑!

就像从我们的旅行报告中看到的一样,俄国人在这次事件以后,没有通知中国人或者起码没有考虑中国人的抗议,而于1913年4、5月间加强了在新疆的兵力。

这支部队(我们同这支部队打过多次交道)原本是俄国人用来阴谋进攻新疆的,1914年1月开始调回欧洲,目的是要全力准备投入世界大战。俄国当时的当权者诚然希望这次战争注定是另外一种结果。

据极其可靠消息来源,我还知道关于俄国军事力量进入喀什噶尔的下述情况:“俄国总领事,索科夫先生(Socoff)显然有征兆要成为新疆第一任俄国总督。他是把紧急情报传送到圣彼得堡的人,结果是勃波洛夫(Bobroff)上校同他的哥萨克士兵出现了。他们完全按战斗规定武装到牙齿,因为他们认为进入喀什噶尔城是要打仗的。当他们在城下由吉玛尔—巴兹派的军政官员接见的時候,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失望!

俄国人就像长时间遗忘的兄弟一样受到欢迎,并且即刻应邀参加当地通常的欢迎早餐(“dastar-khan”),人们在街上隆重的招待他们。这样,这些英雄——大约900人的队伍——极不光彩地开进了喀什噶尔城。他们徒然地看着从什么地方出现的敌人和从心灵深处诅咒索科夫先生,是他毫无目的地把他们从富庶俄国突厥斯坦调到这贫穷的地区。而游手好闲的人总是找机会胡作非为。所以发生了爆炸城门并在通往巴楚的路上企图袭击吉玛尔—巴兹军团的事件。

安集延旅行与逗留^[1]

[1] Andidschan, ‘dsch’是阿拉伯语发音转换为德语字母通常用法,这是糟糕的办法。这个字母的发音更像意大利语的‘giorno’或者像英语的‘to jump’中的j。俄国人说和写 Andishan,其中的‘sh’转换书写字母成了波斯—阿拉伯字母的发音‘ze’[读音像法语中的‘journal’]。这是吉尔吉斯语的发音)。

像往常一样,如果一件事情要问许多人,那么我们出发的日期就要拖延了。

我终于拿到了钱,总共为 6 万马克。在这笔款项中,吐鲁番考察的老赞助者枢密顾问阿伦霍尔特(Arnholdt)、冯·施瓦巴赫博士(V. Schwabach)、爱德华·西蒙(Eduard Simon)以及伯德(Bode)阁下本人,每人各捐赠 5000 马克,克虏伯家族捐赠 1 万马克以及陛下同意从最高权力基金中支付剩余的 3 万马克。

必须尽快筹措装备,因为我们试图在积雪融化之前通过铁列克山口(Terek-paß)。四天之内我们完成所有的购置任务。1913 年 3 月 31 日晚上巴尔图斯(Bartus)和我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在莫斯科我们受到了我们的总领事科尔哈斯博士(Kohlhaas)和副总领事豪施尔特(Hauschild)的接待。同时我访问了柏林运输公司格尔哈德和赫依(Gerhard & Hey)(后来称之为格尔加特和戈依 Gerrgarrt & Gey)驻莫斯科的办事处,并由办事处主任齐默曼先生(Zimmermann)将我推荐给安集延的办事处。

我也拜访了银行并为我在喀什噶尔的俄中银行开了户头。在柏林我们没来得及办这些事。

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事件,我们抵达了塔什干。我们必须在那里停留,要在那里等候拉德洛夫教授(Radloff)为我们办理的俄中边境过境许可证。我们下榻蔡侯饭店(Zacho Hotel),在这里我们成了纵酒宴乐的不情愿的证人,这是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大厅里举行盛大宴会,商界首领和一些军政当局成员前来参加。

巴尔图斯和我坐在一个可以看到整个大厅的包间里吃饭。穿着盛装的客人们渐渐出现了,这是从未有过的隆重。

人们坐下来,饭前食品和伏特加酒端了上来,大家从容不迫地对饮。谈话都压低了声音,给人们以体面交际的印象。

在熟练地敬过白兰地酒以后,丰盛的肴馔连同很多很多美酒都端了上来。各处的宁静被朗朗的笑声和高谈阔论打破了。香槟酒斟得满满的,突然一个小面包或者是类似的东西从桌子的一端飞到另一端。其他的投掷接踵而来;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瞬间我们看到,

两位穿燕尾服蓄着胡须的先生在大厅的地上滚作一团。

大家立即跳起来把两位斗士分开并使他们息怒，人们举着盛满香槟酒的杯子接近他们，与他们同饮、拥抱和亲吻，他们以拥抱和亲吻结成兄弟。

我们看够了就去寻找我们的房间，但是我们却不能睡觉，因为晚会闹得整个房子不得安宁。

第二天整个走廊无人收拾，人们好不容易才能走过去。

我猜测提供的酒里一定也有撒马尔罕的酒。我曾经喝过一杯这样的酒，这种酒很好看，味道也非常好，但是出奇得很，就像火上了头，我明白了为什么亚历山大·德·克里图斯喝了一杯酒以后就吃起饭来了。

过境许可证还没有下来，我被迫向柏林和彼得堡发电报并在此期间拜访了塔什干的最高军事长官波夫鲁克将军(Pflugk)，请求他帮助。将军是位和善的人，态度令人尊敬与称赞。他劝我去安集延并在那里等候必要的证件，他还答应我文件不久即可送达。

由于得到允许我们就踏上了去安集延的路，我们住在一家小的俄罗斯“旅馆”里——人们称之为“奴莫卢(Numero)”。这是一栋很脏的房子，这类俄国旅馆里的“三害”(虱子、臭虫、跳蚤)数量之多，乃至精选各类品种都是现成的，致使我们不得不尽快搬出这家旅店而住到一家比较干净的尽管有点原始的住处，住在穆斯林商人的客栈里。

我很快就去拜访格尔哈德和赫依(Gerhard & Hey)办事处，在营业部遇到被无数当地突厥棉花商贩包围的代表。他们是穿着讲究、举止端庄的先生们——他们之中有几位被我描绘成百万卢布富翁——当我走近向他们行礼，他们很有礼貌地向我还了礼。

代表却稍欠礼貌，他看了推荐信并回答了我的问题，问他是否说德语——以前这个公司所有办事处的人都懂得和会说德语——他付以蔑视的一笑。

他用俄语回答：“不说德语——我们说俄语、波兰语、塞尔维亚语、捷克语或者是保加利亚语！”这个人样子是那么没礼貌和带有敌意，使我遗憾地改变了自1906年以来对这些人的看法。这是俄国人对德国第一次最大敌意的表现，后来我经历过多起这样的事例。